

印尼的政治、族群、 宗教與藝術

蕭新煌、邱炫元 主編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專書（62）

印尼的政治、族群、宗教與藝術

蕭新煌、邱炫元 主編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臺灣·臺北
2014年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印尼的政治、族群、宗教與藝術 / 蕭新煌, 邱炫元主編; ——
初版——臺北市: 中研院人社中心, 民 103.06
面; 公分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專
書; 62)

ISBN 978-986-04-1544-5 (平裝)

1. 政治 2. 宗教與社會 3. 印尼

574.393

103011206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專書 (62)

印尼的政治、族群、宗教與藝術

主 編: 蕭新煌、邱炫元

出 版 者: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編輯校對: 簡心怡、朱婷婷

定 價: 平裝 600 元

售書地點: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出版室)

地址: 115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電話: (02) 2789-8143 傳真: (02) 2782-8157

印 刷 者: 文盛彩藝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100 臺北市中正區廈門街 34 巷 19 號 1 樓

電話: (02) 2369-6300

初 版: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平 裝: ISBN: 9789860415445 GPN: 1010301081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 錄

1. 導論：後蘇哈托時代的印尼鉅變 及其與臺灣的交流	邱炫元、蕭新煌	1
第一部分：後蘇哈托時代的政治轉型		
2. 蘇哈托下台後的印尼： 對於一段激烈過程的再審視	Taufik Abdullah 謝尚伯譯	27
3. 後蘇哈托時期印尼地方自治回顧與評析	戴萬平	59
4. 印尼政黨制度民主化轉型之困境	王遠嘉	93
第二部分：華裔與原住民之族群政治		
5. 制度與族群關係：論國家制度與政策 對印尼本土族群與華人關係的影響	孫采薇	131
6. 印尼後新秩序時期 對於華人少數族群的態度轉變	Johanes Herlijanto 黃克先譯	183
第三部分：華裔宗教		
7. 印尼雅加達華人廟宇普查	梅慧玉	223
8. 行善成神：印尼雅加達華人聖跡崇拜	梅慧玉	283
9. 印尼伊斯蘭與孔教的代理衝突： 印尼華裔穆斯林春節禮拜的爭議	邱炫元	345
第四部分：爪哇的印度教與佛教建築藝術		
10. 印尼婆羅浮屠石刻中所見 原住民建築圖像探討	張崑振	401
11. 從印尼日惹婆羅浮屠浮雕探討 南北傳佛傳的差異	陳清香	453
作者簡介		497

1

導論：

後蘇哈托時代的印尼鉅變及其與臺灣的交流

邱炫元、蕭新煌

一、前言

1998年5月印尼無預警的爆發排華暴動，其根源卻是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社會千瘡百孔，呈現出已經執政近32年的蘇哈托(Suharto)政府之深重沈疴。接下來，這個東南亞最大的，也是擁有最大人口數量之穆斯林社會的國家，便迅速地走向文人執政與民主化，其間過去在新秩序時期被軍事威權體制給壓制住的人權、種族、階級與宗教的矛盾與衝突議題，因為民主化的進程有如掀開潘朵拉的寶盒而一一浮上檯面。蘇哈托下台之後繼位的幾任總統，幾乎都是在一面進行政體改革，另一面則須同時處理紛擾的內政議題當中搖搖晃晃地走過。2001年911事件之後，印尼的激進穆斯林團體所製造的暴力攻擊與社會抗議，更加激發世人對這個大型穆斯林國家的矚目，關切印尼的民主轉型是否能夠平順，及其對於區域安全的衝擊。本書共收集十篇論文，邀稿的主要編輯方針一開始是以《亞太研究論壇》所收集的論文，從其中挑選出符合本書主題的論文，再請各篇作者修改後進行審查與再修改，但事實上，其中有四篇論文算是新文，有的是原作者的新作品；有的則是編者邀稿的新論文。本書各篇論文所涵蓋的時間除了歷史背景的介紹，多半聚焦在1998-2009年，亦即後蘇哈托十年。

因此，我們將在第二節介紹對應本書各章之印尼政治、族群與宗教變遷的近況，除了藉此作為簡介與定位本書各章的歷史背景，並可

彌補 2009 年之後印尼的新進展以及相關議題的研究現況。在第三節中，我們為了凸顯印尼與臺灣之間多重的經貿、教育與文化的交流，將聚焦於尤多約諾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總統所發動的「印尼崛起論述」和相對應的政策作為，及其對於晚近印尼與臺灣交流的影響。最後，我們將對臺灣的未來印尼研究的若干限制與挑戰，除了介紹其作品未能有機會受邀收錄於本書的幾位臺灣的印尼研究學者，並對未來印尼研究提出一些建議與期許。

二、本書各章所論述的當代印尼政治、族群關係與宗教變遷

(一) 民主鞏固與社會分化

本書的第一個部分是後蘇哈托時期的政治轉型，一共包含三篇政治學學者的作品。Taufik Abdullah (第二章) 是印尼資深的政治學學者，這篇論文脫胎自他那本六百多頁的印尼現代政治史巨著 *Indonesia: Towards Democracy* (2009)。該文主要回顧以蘇哈托自 1998 年下台之後，以幾位繼任者之任期為綱，一方面鋪成其間印尼所發生的重大政治與社會事件，另一方面則有檢討與回顧一直到現任印尼總統尤多約諾第一任任期，並回顧這其間幾位總統施政的利弊得失。Abdullah 以一種知識分子對於印尼民主發展感懷憂時之期盼的情感，流貫與精準扼要地鋪成其分析，不但可以幫助讀者掌握 1998-2004 年印尼政治史的發展精要，更重要的是，他特別指出世人經常忽略依憲法在蘇哈托之後繼任的哈比比 (B. J. Habibie)，雖然以前朝罪臣與共犯餘孽之嫌在缺乏民主正當性的前提下出任總統，但是他短暫繼任期間所提出的法案卻對接下來的印尼民主化發展奠下良好的契機。

戴萬平的〈後蘇哈托時期印尼地方自治回顧與評析〉(第三章)，則是幫我們回顧印尼建國至新秩序時期的結束，印尼中央與地方關係

的發展沿革，以至哈比比總統展開地方自治法制的修訂，及其對於印尼後續地方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影響。地方自治賦予地方更大的行政與財政自主權，也賦予我們從地方的層次來考察印尼民主鞏固以及發展議題的新頁。王遠嘉的〈印尼政黨制度民主化轉型之困境〉(第四章)重溯印尼政黨政治之歷史，並在他的分析中指出後蘇哈托時期的政黨政治發展的諸多亂象。第一個部分的三篇論文，可以適度的補充我們對印尼獨立後政制發展的歷史知識，更可以讓我們了解到2009年印尼民主政治所遭逢的挑戰。當然，對於印尼區域研究來說，印尼政治研究總是最為首要與熱門的議題，未來還有待更多臺灣學者投入相關領域的研究。

誠然，後蘇哈托時期縱使發生許多的衝突與暴力事件，然而印尼也令世人驚訝地完成文人執政、國會議員間接選舉總統，以至於進一步邁向總統直選。更推動地方自治的改造，讓民主的精神貫徹在地方選舉。甚至連大家擔心的較為保守反動立場的伊斯蘭政黨也不如預期未成為政黨政治的主流，而避免印尼伊斯蘭的政治化。因而有不少人樂觀地相信，印尼正可成為成功民主轉型的穆斯林國家的典範。然而，近來若干西方學者似乎對於這類樂觀論抱持較為保留態度。Vedi R. Hadiz 和 Richard Robison (2013) 即認為，民主選舉和地方自治的確降低過去新秩序時期中央政府的集權掌控而將更多地方自治的權力下放。然而，印尼政治文化濃厚的侍從主義特徵，並未因此而轉變。反倒是過去的官僚與政客披上新的外衣，在不同的政治組織掩蔽下參與地方選舉。Hadiz 和 Robison 認為，後蘇哈托時期的政治權力結構依然是以政治寡頭 (oligarchy) 的統治為特徵，印尼的公民社會仍然尚未取得獨立的政治與社會空間，即使因為威權消散進一步所帶來的新自由主義 (市場化與私有化) 的趨勢的確存在，但是利用侍從體制來分配政治與經濟利益的現象仍然盛行。而更為反諷的是，地方自治則讓這種侍從體制向地方的行政區域往下發展而盤根錯節，更

多政客汲汲營營於在地方尋找經濟開發計畫所挾帶的油水。

Edward Aspinnall (2013) 則更進一步指出，地方自治與印尼經濟解除管制的呼聲裡應外合，這種體制的發展看似將政經利益平權分配雨露均霑，但事實上則是進一步導致印尼政治與社會結構的零碎化 (fragmentation)，這種零碎化趨勢反映在四個層面。首先，中央權力下放之後，昔日的尋租者現在可以繞道中央，而直接在地方協商利益。這種利益的分化，承繼印尼舊有政治文化中強調恩庇主與侍從關係。因此，在後蘇哈托時代中這種政治文化大體上並未改變，只不過這種政治利益分配的網絡，隨著地方自治與分權，而將網絡的貫串變得更零碎而散置在各個地方行政體系的層級。印尼新自由主義的浪潮所引發的鼓勵開發地方自然資源或開發計畫，讓這種恩庇主與侍從關係產生新的經濟資源的奧援，而讓這種政治文化與強調個人政治利益雨露均霑的權力網絡，遠繞中央而往地方的層級往下盤根錯節，甚至讓更多地方政客、動員地方與族群認同的呼聲來要求進行行政區域的再劃分。第二，主要政黨得票率急速下降：自 1999 年後，多次的大選均呈現沒有任何政黨可以得到過半，而在地方選舉亦是如此。在過往政黨所扮演重要的政治力分配的角色和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

第三，非政府組織：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在各個層級的行政區域設立，各自設定不同花八門的議題，但是這些非政府組織卻變成另外一種變相的尋租者，並未能針對議題對症下藥，而通常是忙碌著向海外贊助基金會兜售議題、尋求金援，並未能成為集結民力，推動與保衛公民社會的建立。第四，穆斯林組織：過去印尼的兩大穆斯林組織「宗教學者復興會」(Nahdlatul Ulama, NU) 與「穆罕默迪亞」(Muhammadiyah) 可以說基本上穩固了穆斯林社會的重要功能。但是新形成的伊斯蘭政黨「繁榮正義黨」(Partai Keadilan Sejahtera, PKS) 以及和中東有跨國連結關係的「解放黨」(Hizbut Tahrir)，在宗教派性和政治導向中重新瓜分了原先兩大穆斯林組織的群眾。印尼

伊斯蘭宗教場域的分殊化，一方面具有世俗性的與寰宇精神的色彩，參雜許多都會中產階級穆斯林的宗教需求而被商品化與都會化；但另一方面，在性道德和對新興伊斯蘭教派的包容力卻日趨狹隘。這種伊斯蘭宗教場域的分殊化雖一方面呈現穆斯林組織的百花齊放，但卻同時削弱兩大穆斯林組織過去所具備穩定印尼穆斯林社會的作用。

（二）族群政治與華人參政

本書第二個部分的主題是「華裔與原住民之族群政治」，共收錄兩篇論文。分別透過族群政治的宏觀面向，以及人類學田野觀察之微觀取向，讓我們對印尼華裔的族群問題，透過更具有歷史縱深的爬梳而連結至對當下華人族群政治的發展產生更多臨場感。孫采薇的〈制度與族群關係：論國家制度與政策對印尼本土族群與華人關係的影響〉（第五章），從印尼的族群政策來觀照國家、多數原住民與少數華裔三者的互動關係，她提供了一個歷史貫時性的與宏觀結構性的視點，讓我們綜觀自印尼獨立後族群政治的發展，特別是聚焦在原住民多數與華裔少數的互動關係。最後，孫采薇已經看到後蘇哈托時期華人重新參政的趨勢，相信這是未來我們觀察印尼華人重新回返政壇，參與印尼政治的一個很重要的切入視點。當然，在目前的族群政治環境中，印尼華人參政總難免要面臨訴諸宗教派性與種族主義議題的操弄。Johanes Herlijanto 的〈印尼後新秩序時期對於華人少數族群的態度轉變〉（第六章），則討論他在 2009 年在東爪哇泗水（Surabaya）進行他的博士論文（Herlijanto 2012）田野，對於當地原住民與華人族群的互動的觀察。Herlijanto 與一般做印尼華人研究的作品對於印尼族群文化多元包容論所呈現出的悲觀或懷疑論有所不同，他看到後蘇哈托時代，東爪哇泗水都會開放的城市文化氛圍，允許中產階級保有開放的族群多元並存空間，加上印尼伊斯蘭多元主義的醞釀以及更多印尼原住民因為中國崛起而將中國視為經濟與文化發展學習的新

典範，因而讓印尼華人與原住民彼此之間產生更多相互支持與彼此認同的同理心。

蘇哈托下台一部分的原因起自 1998 年 5 月的排華暴動，因此華人的族群政治似乎總是成為我們最為關注的現象。但作為臺灣的研究者不妨反思，是不是我們限於對華人的關切而忽略了對印尼整體族群政治應有的全盤性觀照，甚至過度誇大印尼華人議題？蘇哈托時代剛結束時，在 1998-2001 短暫的三年之中，族群暴力衝突蜂起，讓許多觀察家悲觀地預測一種不安定的未來（Bertrand 2004）。然而，Edward Aspinall（2011）卻認為，在此之後，印尼的族群政治問題卻似乎不如先前預測分析那般悲觀。地方自治固然也有族群利益訴求的問題，但族群性政黨往往必須與全國性政黨合作，而削弱這些族群政黨在地方選舉中的政治分量。不容諱言，在某些地方選舉中，族群訴求還是扮演某種驅動的機制，但為求勝選，跨族群的正副首長候選人搭檔極為常見並同時消解族群隔閡。族群的利益在現實上無法壓過更大的恩庇侍從政治利益瓜分的利益。因此，民主選舉還是促進跨族群政治聯盟的可能，也削弱狂熱族群主義的政治動員能量。

整體來說，印尼的族群政治並非政治運作的主要驅動機制，但我們可以藉由後蘇哈托時期華人參政與投入選舉的比較性觀察，作一些理論觀點的檢視。華人參政，反映出華人逐漸勇於跳脫狹隘的族群圈，而挺身共同接受民意的檢視。但若以華人參選的經驗來看，即使印尼社會的風氣已經慢慢接納華人參政，既有的政治風氣依然對華人來說充滿著挑戰。以下以兩個城市選舉的例子來作概述性的比較。2010 年 5-6 月蘇門答臘北邊的棉蘭市（Medan），首次有華人陳金揚（Sofan Tan）出來參選，經過兩輪投票，陳金揚最終落敗。而期間他的競選對手原住民穆斯林陣營，都曾運用過族群與宗教的因素來動員並攻擊他的正當性（陳金揚是佛教徒）。另一個例子是 2012 年雅加達（Jakarta）特區行政首長選舉，有華人背景的鍾萬學（Tjahja Basuki

Purnama) 出馬搭配原住民首長候選人 Jokowi。在競選期間，鍾萬學的基督徒和華人背景一樣被對手攻擊，但最終還是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勝選。一部分的因素可能與雅加達特區的都會中產階級選民較重視候選人的清廉與政見而不受族群與宗教操弄有關。

華人族群政治的發展除了有賴印尼國內經營一個更開放的政治氣氛，中國崛起的因素對於未來的影響似乎應該納入我們的考量與觀察。Herlijanto 的研究雖然揭示著因為中國崛起和印尼都會區族群政治的開放，使得越來越多的印尼都會菁英願意用更開放包容的心胸看待印尼華人。但是，他也表示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積極與印尼僑社建立關係並要他們扮演中國與印尼之間的橋樑，這些動作可能在一部分原住民菁英心中，引發印尼人對華人存有「第五縱隊」之疑慮。這種曾經在新秩序初期反共冷戰氣焰之盛時出現的反華情緒，是否又會再度滋長？此外，也有印尼在地商人抱怨，中國崛起對印尼的經貿利益似乎大多為華人所包攬。這些負面的觀感情緒，是否又會滋長醞釀而在日後又引發族群矛盾，頗值得我們深思借鏡。¹

(三) 宗教多元性與公民權

印尼作為一個穆斯林多數的民主國家，如何同時維繫穆斯林認同與伊斯蘭力量的崛起，兼顧其他宗教的多元性而讓印尼的宗教公民權得以被維護，實在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而印尼華人宗教活動在後蘇哈托時代脫韁而出，各種宗教團體活躍，其中特別以過去在蘇哈托時代受到打壓的華人民間宗教跟孔教 (Agama Khonghucu) 最令人矚目。在後蘇哈托時期的民主化進程中，宗教自由和多元並立的緊張與衝突一直都是相當顯著的議題。印尼伊斯蘭和其他宗教的多元復興，為印尼宗教自由和公民權的問題帶來更多的挑戰 (Parker and Hoon

¹ 邱炫元與 Herlijanto 電子郵件通訊討論之內容。

2013)。卸除新秩序時期對於政治伊斯蘭的打壓，許多新興的穆斯林團體在印尼的宗教場域中快速成長。若干較具保守色彩的穆斯林團體對於伊斯蘭地方法的推動，或是對伊斯蘭新興教派、女性情色刊物的打壓和反對推廣保險套避孕等保守的性別觀念，不免給其他的非伊斯蘭宗教團體帶來壓力，也為印尼穆斯林社會的開放帶來疑慮。然而，就在這種復興和保守抵制多重力量所形構的複雜宗教人文景觀中，印尼華人宗教活動在公共領域中再度重現。

過去對於改革時期的華人族群文化勃興的探討與關注多半在於族群認同、教育、媒體再現以及華人社群的權力結構等議題；有關華人宗教議題相對而言則比較少。雖然近年來印尼華人孔教、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已經受到較多的關注，但是更能彰顯華人族群文化傳統的民間宗教研究，相對而言數量甚少。其因有二，一方面受到蘇哈托政府的政治打壓的影響，華人年輕世代對於這些宗教文化已較為陌生。二方面則是因為研究者必須同時具備印尼文化、漢人宗教（或漢學）或可能還需要印尼民間伊斯蘭文化的知識背景，因而使得印尼華人民間宗教的研究，對於西方研究者來說也是個挑戰。除此之外，基本上印尼華人民間宗教的研究，仍需投入更多的田野調查，原因在華人聚落分散於遼闊的印尼國土，而不同的華人聚落彼此間還是存在著相當程度的社會與文化之差異性。

本書第三個部分的主旨是印尼華人當代宗教生活的調查。此部分共收錄三篇論文，自 2004 年開始進行印尼華人民間宗教調查的梅慧玉，將她在 2004 年一共在雅加達停留七個月的田野調查成果，在本書中呈現兩個在方法上具有對照性意義的研究。第一篇論文〈印尼雅加達華人廟宇普查〉（第七章），她大範圍地鳥瞰雅加達都會區華人 80 間廟宇的宗教生活與祭典儀式，並對當時的廟與人文生態和正在發展中的幾個新趨勢提出分析，這個研究可以說是對法國資深的印尼華人研究歷史學家蘇爾夢（Claudine Salmon）與龍巴爾（Denys

Lombard)在1960-70年代轉換之初的先鋒性調查之不足的補充與延續(Salmon and Lombard 2003)。第二篇論文〈行善成神：印尼雅加達華人聖跡崇拜〉(第八章)則是針對華人民間宗教與在地文化交融的兩種類型現象的探討。她探討了雅加達華人廟宇祭祀在印尼當地成神的神祇以及附身在乩童身上的神靈。有關華人祭祀當地的神祇及其和穆斯林聖墓崇合流的現象，在馬來西亞和印尼雖然已經有相關研究提出，但梅文中最引人入勝之處在於發現乩童與其附身之神靈之靈界感應，同樣存在著漢番之辨。印尼的華人民間宗教卻能就地採借，將爪哇的民間信仰和民間伊斯蘭的神靈與祭祀的元素揉合進來。

邱炫元的〈印尼伊斯蘭與孔教的代理衝突：印尼華裔穆斯林春節禮拜的爭議〉(第九章)，則是從印尼華人穆斯林在清真寺以伊斯蘭禮拜聚會的形式來進行新春團拜，卻意外引發當地對華人傳統禮俗較不了解的穆斯林，對於印尼華人的春節禮拜是否違反伊斯蘭法產生疑慮。邱文發現這些爭議，卻又同時涉及到印尼的新興華人教團孔教對於春節的宗教性定義，因而使得整個爭議的過程，呈現出複雜的糾結在華人文化傳統與印尼伊斯蘭文化多元性的對話與衝突。這三篇論文，呈現出進行印尼華人宗教研究的困難度，必須同時跨越印尼伊斯蘭文化以及民間宗教文化知識的兩重障礙，也因此點出了為何此一領域至今仍少有西方學者涉入的原因。

邱文指出華人宗教團體之間對於春節的宗教意涵的詮釋，彼此間有時會產生意想不到的磨擦，涉及到宗教組織與地方菁英對於華人傳統正朔詮釋權的競逐。正如雲昌耀(2012)發現後蘇哈托時期對於華人文化的詮釋與代表性，在不同的華人社團會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緊張關係。這樣的現象同樣反映在華人宗教傳統的復甦，常常關涉到華人社群宗教信眾版圖的重新劃分，以及對於華人文化習俗正統之專有的宣稱，而引發詮釋的爭論，如印尼華人穆斯林想要運用以清真寺禮拜的方式慶祝春節，卻因為印尼孔教將春節列為首要宗教節日(祭天)，

而引發印尼穆斯林對於兩造說辭的質疑與辯論。印尼華人新教牧師擔心因為教會的信眾在這股追尋華人傳統民俗文化的熱潮之中，又重新被華人民間宗教的多神信仰給吸引而改宗，因此必須著書廓清這些屬於民間信仰的範疇皆不宜基督徒去追尋或肯定（Tan 2008）。然而，在現實中，華人宗教團體彼此間除了競爭也有合作。運用布蘭登柏格（Adam M. Brandenburger）與奈勒波夫（Barry J. Nalebuff）的「競合」（co-opetition）概念（2004），可以更傳神地描述不同的印尼華人宗教團體，雖然對於宗教與文化傳統的詮釋以及信眾市場的爭取立場不一，但是當面臨當地華人社區的整合需要以及面對原住民穆斯林的生存性壓迫而需團結之需求時，彼此間產生有實際競爭但又相互合作的複雜關係。比方說，印尼華人改宗伊斯蘭宗教雖仍然會引發華人家庭的反對與華人朋友的排擠（Chiou 2009），但是東爪哇泗水的華人穆斯林分會卻仍然贏得地方華社的支持，並將他們視為與原住民穆斯林社群進行溝通與交流的重要平台（Chiou 2007）。

此一部分的三篇論文，各自從民間宗教、孔教與伊斯蘭教等不同面向，指向一個東南亞華人宗教在地「文化轉譯」（cultural translation）的理論議題。探索當代印尼華人宗教在後蘇哈托時代的轉化最為有趣之處，在於討論所謂中國宗教或是漢人宗教的傳統與型構，一旦在印尼或是馬來世界這個異地與異文化脈絡裡發展，在信仰的宇宙觀、儀式的遂行與組織的發展會出現怎樣的脈絡性差異（李豐楙 2009）？印尼華人宗教的跨地轉譯性，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來自於印尼政府華人政策的制約，另外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禁止華語文的教育，使得華人宗教的語言（包括經典、善書的翻譯、祭拜和祈禱、祭典）等必需仰賴大量印尼語的翻譯。這點表現在孔教將傳統四書五經的翻譯，以及運用印尼語來講授解讀中國儒學和神聖的觀念。或者，比如孔教試圖將祭拜的肢體動作如持香的姿勢、跪拜和禱辭，類比於伊斯蘭法中的宗教儀式（職責）（*ibadah*）規範，用更為理性與精確的

印尼語來陳述與標準化。還有，華人經常會運用混雜印尼語、華語和方言的使用來遂行華人民間宗教。

（四）印尼宗教遺址與建築藝術

本書最後一個部分收錄有關爪哇的印度教與佛教建築藝術，此乃當今臺灣的東南亞研究仍然有待開發的新領域。張崑振（第十章）與陳清香（第十一章）分別對中爪哇日惹（Yogyakarta）地區著名的婆羅浮屠（Borobudur）遺址所做的圖像分析，顯示出臺灣東南亞研究的多元面貌。東南亞考古和宗教建築藝術的研究乃是一個小眾但卻極為重要的研究領域，它的研究基礎經常要建立在豐富的博物館館藏和現地考古挖掘的調查。張崑振與陳清香各自從建築史和佛教美術的觀點，並結合佛教經典的資料，從南島建築和佛陀傳記為題針對中爪哇婆羅浮屠石刻上的造像分析。張崑振的研究顯示出臺灣的建築史研究者如同黃蘭翔（2008）一樣，結合西文和日文的研究文獻仍然可以做出很精采的研究，而陳清香則凸顯中國佛教與印尼佛教藝術比較分析其各自殊勝之處。印尼的區域研究多半是關注當代的政治與文化議題，要針對歷史與古蹟建築甚或考古的研究，往往牽涉到倚賴殖民地檔案、博物館館藏和資金規模龐大的現地挖掘。因此，本書所收錄的兩篇臺灣學者的研究，以他們在地的觀察再輔以相關的學術文獻研究的成果來做分析，確實有令人可喜之處。

三、結語：「印尼崛起論」與臺印交流新趨勢

臺灣的東南亞研究偏重在某種形式的跨國研究，其實反映出不得不然的限制（邱炫元 2013）。但近來印尼與臺灣的發展關係，卻意外的證成這種跨國研究的必要性。後蘇時代印尼的崛起論和臺印兩地更頻繁的交流，在在皆說明臺灣對於印尼研究有其新而迫切的需要。

閱讀 *Tempo* 新聞週刊的封面標題，多半是有關貪污、宗教與種

族衝突暴力、環境汙染與天然資源過度開採、貧困與繁複難解的社會問題等。對於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國家的民主化之樂觀預期，總是無法遮掩這個國家過去歷史、政治與社會發展所遺留下來的沉重包袱與困局。但自現任總統尤多約諾 2004 年上任之後，印尼的發展逐漸穩定，在政治與經濟的變遷逐漸上軌之餘，有關「印尼崛起」的討論也慢慢開展。Nasir Tamara (2009) 以專著探討在印尼民主化之後，關鍵性的相關議題如政體、軍事、文官、科技、工業、外交政策、經濟、媒體與文化藝術等領域的興革需要更多的思考與擘畫。東南亞史學家 Anthony Reid 在榮退之前，意有所指的邀集各方學者，從幾個不同的面向，探問印尼是否有可能接替在中國與印度之後，成為亞洲的第三大國，並在 2050 年達成這樣全面性發展的目標 (Reid 2012)。在 Reid 這本論文集集中，有兩個問題點相當值得關注，印尼要成為亞洲的大國，在知識的創新和累積與國民的心態，是否已經具備分享討論與研發創新的素質，可以積累追尋探索國家的未來發展所需的能量 (Guggenheim 2012)？還有，從穆斯林國家的角度來說，印尼既然是個大國，為何印尼穆斯林學者、思想家與行動者，鮮少像其他幾個穆斯林國家可以引領風騷，並成為激盪伊斯蘭世界思潮和現代性論述與制度創發的世界引領者 (Bruinessen 2012)？

(一) 印尼總統的「2030 年印尼發展宣言」與東亞的國家競爭力文化

2012 年 11 月 13 日，尤多約諾總統發表了「共同邁向 2030 年繁盛印尼願景」(Penyatuan Visi Bersama Menuju Indonesia Maju 2030) 宣言，擘劃出印尼未來的經濟發展策略。令人驚訝的是，他不少理念與策略的選擇卻是立基於著名的麥肯錫全球研究所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的報告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2)。當中預測了 2030 年印尼將成為第七大經濟體，並形成一個具

有一億三千五百萬具有消費能量之中產階級。雖然尤多約諾的演說並非全盤照抄麥肯錫的研究報告，在經濟發展重要性之餘，也同時強調印尼建國五原則中追求的社會公平正義的精神，以及永續發展的原則。印尼政府的國家未來發展綱領的擘畫竟然是政府單位委託麥肯錫的競爭策略調查公司的一百頁研究報告，顯示出原先盛行在東亞的國家競爭力等新自由主義的文化思維和意識型態，也傳佈到了東南亞。

（二）「印尼離散社群」：柔性實力、僑居與移民社群？

印尼駐美國大使 Dino Patti Djalar，在 2012 年 7 月 18 日，在洛杉磯發表他編輯的新作，《生命篇章：海外印尼僑民的成功之路與生活觀》（*Life Stories: Resep Sukses dan Hidup Diaspora Indonesia di Negeri Orang*），開始引發各界對於印尼散居社群（Indonesian diaspora）概念的熱烈討論。在過去，印尼政府鮮少關注海外僑民的議題，或者，從印尼建國以來一直以排他性的方式界定印尼公民的身分，排除華人和雙重國籍的身分之歷史軌跡。印尼的國民身分與認同傾向於排他和敵視「外來者」的觀點。Djaral 大使，一位在尤多約諾第一任總統任期擔任約五年的總統發言人，也是印尼建國以來，擔任總統發言人最久的官員。他出身外交官家庭，與尤多約諾關係匪淺的他，在提出了印尼僑居社群的概念之後，之後就看出印尼政府開始在推廣如何將「海外印尼僑民」的經濟力量結合到國家整體的發展。

近幾年，印尼海外移工遭遇雇主凌虐的現象相當普遍，印尼政府當然無法禁止對國外輸出印尼勞工，但也一直在思考如何保障海外勞工的人權與勞動權益，以及提升他們的人力資源水準的問題。此外，印尼近年來財政獲得改善，政府有能力派出更多的公費留學生到歐美和亞洲工業與科技先進國家留學。在臺灣有近二十萬的印尼勞動人口，當中又有相當高的比例是穆斯林，這些穆斯林勞工一方面教育程度多半為中學，又因為海外工作勞動條件較為不佳，因此對於宗教生